

“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探析^{*}

梁 钦 李毓博

[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区域大国土耳其在百年诞辰之际提出“土耳其世纪”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愿景。“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既涉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也是土耳其在总结百年治国经验基础上对于第二个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土耳其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筹划。土耳其此时出台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源于埃尔多安及其政党的选举需求,更源自新地缘政治现实的对策预案及由此产生的“土耳其世纪”大国政治想象,同时基于土耳其国家的独立自主理想。“土耳其世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土耳其的主观努力,还有赖于区域和国际大环境的助力,严峻的外部形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目标的达成。

[关键词] 新兴经济体 土耳其世纪 国家战略 黑海区域安全 埃尔多安

[作者简介] 梁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跨大西洋关系、中东问题;李毓博,英国杜伦大学政府和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99周年的前一天即2022年10月28日,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土耳其世纪”计划揭幕仪式上发表一份重要声明,首次公布了题为“土

^{*} 本文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黑海通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JZD037)。

土耳其世纪” (Century of Türkiye) 的新国家战略愿景文件。^①该文件概述了“土耳其世纪”愿景的精神与本质, 阐述了土耳其内外政策的计划和目标, 也充当了埃尔多安总统竞选的制胜武器。2023年4月即土耳其大选前一个月, 埃尔多安总统正式发布正发党的竞选宣言——《土耳其世纪的正确步伐: 2023年竞选宣言》(《土耳其世纪宣言》)。^② 该选举宣言可谓此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土耳其世纪”计划的详细版本, 共481页, 围绕灾害应急管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国家安全六大主题, 确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第二个百年的各项长期目标, 指明其战略政策的方向, 并宣布将建立土耳其支轴 (Axis of Türkiye), 推动土耳其走向进步、发展和全球参与的未来。埃尔多安竞选成功后, 该文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施政纲领, 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本文拟依据土耳其官方相关文件及领导人讲话对这一新国家战略愿景进行系统分析, 以期把握其国家未来发展的脉络和走向。

一

2023年4月11日土耳其共和国百年诞辰前夕, 执政逾20年的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开启“土耳其世纪”。这一愿景的提出表明, 土耳其共和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开启共和国的第二个百年。“土耳其世纪”战略出台标志着土耳其完成了角色观与世界观的历史性蜕变, 即土耳其不再甘当其他大国的追随者, 而是志在成为其他众多国家的追随者, 其主体性正在空前强化。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世纪”建立在改革基础上, 这种改革既包括了国内改革, 也包含了国际体系的改革。当然, 正如埃尔多安所强调, 土耳其

^①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Tccb, October 28, 2022, <https://www.tccb.gov.tr/haberler/410/141370/-turkiye-yuzyili-programimizla-cumhuriyetimizin-yeni-yuzyilina-guclu-bir-baslangic-yapmak-istiyoruz->.

^②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şi,” <https://www.akparti.org.tr/yayinlar/tu-rkiye-yu-zyili-ic-in-dog-ru-adimlar-2023-sec-im-beyannameşi/>.

国家发展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世纪”宏大愿景的实现必然要妥善应对各种障碍、风险与挑战。因此，埃尔多安政府为土耳其内政外交设定的革新蓝图将成为“土耳其世纪”愿景践行的风向标。埃尔多安声称，“土耳其世纪”预示着一场革命，将把民主政体、发展、和平与福祉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希望土耳其共和国开启新世纪，进入全球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等各领域的十大国家之列。^①“土耳其世纪”包含了对土耳其共和国过去百年历史的总结和对土耳其特性的强调，更是对共和国第二个百年的战略性规划。土耳其似乎正准备实践积极主动的战略构想，该构想融合了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理性和土耳其国家扩大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抱负。

（一）推动制定新宪法，加强土耳其民主、人权和法治建设。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世纪”愿景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制定一部新宪法，这是国家意志的核心产物；争取将完全基于国家意愿、民众广泛参与、多元、自由的新宪法带入“土耳其世纪”。^②对于共和国初期强硬西化、世俗化政策以及以维护世俗共和国为口号周期性上演的军人干政，埃尔多安政府进行了负面性叙事，更多地将其看成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性阻碍，进而强调必须依靠本民族自由、独立、自主的意志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前进。埃尔多安总统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希望通过制定新宪法，使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成为新时代的转折点，为土耳其的民主斗争加冕，进而改变土耳其政治的风格、运作方式和前途。^③

新宪法的核心特征就是体现民族意志。埃尔多安宣称，“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国家的企图从未停止过。在这些肮脏的企图中任用的傀儡也从未停止存在。没有依靠至高无上的民族意志，而是依靠监护力量，使我们的国家浪费了黄金岁月”，坚持民族意志、为民主和发展而提出的爱国主义倡议也

①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p.6-8.

②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345.

③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24.

屡屡遭遇政变和“监护者”的桎梏。^①通过“受害者”叙事，埃尔多安将自身塑造为“民族意志”的代表，将“土耳其世纪”愿景视为造福于土耳其民主、人权发展的“民族意志”，将内政外交的深层次革新合理化，将美西方和国内反对阵营眼中的离经叛道之举合理化。新宪法的制定属于土耳其国家治理百年历史的总结，构成了土耳其第二个百年的国内政治基石。新宪法的制定意味着土耳其对共和国百年史的重新评价，更意味着对国家前进方向的重大校正，体现了土耳其国家社会关系的再调整，象征着土耳其国家身份的新定位。

(二) 强化国防自主技术，建设全球经济强国。“土耳其世纪”经济愿景是全面发展，以投资—就业—生产—出口链建设为核心，以绿色和数字转型为导向，通过经常账户盈余提高生产力；同时，最大限度地挖掘发展潜力，使“土耳其世纪”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纪。^②埃尔多安强调，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土耳其发展为全球贸易、工业和能源中心之一。“土耳其世纪”的经济维度强调土耳其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国防工业、外交、经济、能源等领域的政策更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目标。

土耳其认为，先进的国防工业是强大经济的重要前提之一。“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中提出的国防工业目标是，通过减少对国防工业的对外依赖，进一步提高国产化速度，大力推进投资和技术创新、技术突破，实现完全独立的国防目标，为国家和利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保持土耳其的威慑力和地区优势地位，为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稳定服务，最终实现可持续的繁荣增长。^③土耳其积极鼓励原创性国内生产，持续大量投资于自动化和无人驾驶系统等新技术领域，力图将其打造成为全球国防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土耳其品牌。新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于国防工业的高度重视，意味

①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3.

②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p.179-180.

③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p.254-261.

着土耳其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提档升级,将为土耳其世纪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的经济和军事基础。

(三) 积极推行多边外交,打造外部支轴,扩大全球影响力。“土耳其世纪”愿景标志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折,未来土耳其外交将呈现出更加积极主动和多极化的取向。在“土耳其世纪”愿景中,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在公正、稳定、包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效、独立、有活力和有复原力的土耳其支轴国;同时,通过充分利用土耳其的新时代,巩固土耳其作为区域大国和全球行动者的地位;^①并且通过积极地使用包括突厥语、穆斯林、中东、欧洲、亚洲等多重身份来构建土耳其支轴身份。文件指出,土耳其应该有一个全球外交政策的视野。正发党执政期间努力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全球行动者,“土耳其世纪”是一个涵盖所有区域的愿景,而不是仅仅关注区域问题的外交政策。^②从某种意义上讲,“土耳其世纪”是土耳其的“世界新秩序”宣言,这种新定位意味着夯实区域优势地位的同时,希图迅速扩大全球影响力,而外交在实现目标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四) 全面打击恐怖主义,捍卫土耳其的独立与安全。“土耳其世纪”强调土耳其的安全问题,将发展、稳定、财富、和平与繁荣视为土耳其的安全目标,在所有安全领域实施“预防性”的基本战略,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强调将反恐外交制度化,不给国外的恐怖组织任何机会,绝不允许欧洲和美国的舆论被居伦主义、库尔德工人党和左翼恐怖组织所愚弄和利用。同时强调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跨境行动,致力消除“恐怖走廊”,其最终愿景是将恐怖威胁从国家议程中删除,铲除恐怖组织,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③恐怖主义一直被土耳其视为影响其成为全球强国的最大阻力,土耳

①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p.388-391.

②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400.

③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p.438-442.

其决心通过在国防工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以及土耳其武装部队等多方面的投入，在反恐斗争中采取更加自信的步骤来巩固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战略中重点阐述恐怖主义，表明了恐怖主义对于土耳其世纪战略的结构性制约。由此，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成为土耳其世纪战略的核心部分。

（五）推进国际体系变革，促进全球秩序的公平化。“土耳其世纪”愿景提出通过三个外交战略带为土耳其打造多维度、多方位的轴心，其中第三个战略带是引领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①埃尔多安强调，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努力推进全球体系变革。他在各种场合发声称“世界远大于五”，呼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土耳其世纪宣言》指出，全球体系脆弱的主要原因是国际机构不能有效运行，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架构；气候异常变化、粮食安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诸多超国家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以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健康、透明、有效和负责的全球治理架构。^②故此，埃尔多安得出结论：改革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构势在必行。

土耳其以促进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和平为旗帜，将自身定位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在土耳其外交哲学的革命性变化中，“人道主义”和“进取主义”两大特征众目具瞻。“我们是在周围战争、冲突和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通过与各方建立平等、道义和公正的关系，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的唯一国家。”^③人道主义已成为土耳其外交的“金字招牌”，不仅增强了土耳其外交的软实力，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形象，切实改善了土耳其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而且使土耳其借助冲突调解人的角色穿梭于博弈场中，极大地提高了影响力。“土耳其世纪”愿景的实践对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特殊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①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421.

② “Türkiye Yüzyılı İçin Doğru Adımlar:2023 Seçim Beyannamesi,” p.428.

③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20.

二

“土耳其世纪”愿景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务实的、以利益为导向的方针政策。它反映了土耳其对于全球格局变迁的认知和土耳其对于未来国际角色的追求。土耳其积极谋求在全球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此对内政外交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的提出既反映了国际、区域和土耳其自身局势的变化，也是各个方面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土耳其世纪”愿景文件的推出是埃尔多安竞选总统的策略考量。2023年既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00周年，也是总统制改革后的第二次大选，其重要性对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来说不言而喻。对于寻求连任的埃尔多安来讲，竞选口号和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何况，埃尔多安面临的竞选局势远非乐观。从2018年货币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前后经历了各类经济问题，如货币持续贬值、通胀率飙升、生活成本加剧、失业率高涨、购买力急剧下降，2018年土耳其GDP年增长率从之前的7.4%下降到2.6%。^①埃尔多安此前的激进财政政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些恶果导致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竞选中失去多个重要城市，而且支持率大幅下滑。2019年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这两个大城市地方选举中的失利，暴露其影响力正在减弱的事实。为此，埃尔多安迫切需要向支持者和大众选民证明自己是可以把土耳其带入美好新世纪的唯一政治家。

埃尔多安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性时刻，直接关系到2023年总统和议会选举的战略目标能否达成。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将“土耳其世纪”愿景作为其首要的竞选口号。一般竞选口号与主题都涉

^① Bulent Alirizaand and Zeynep Yekeler, “The Turkish Economic Slowdown in 2018,” CSIS, March 20,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urkish-economic-slowdown-2018>.

及一个共同的时间，把现在的情境和方向与过去、未来连接起来。这种语言中介的时间性政治是政治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① 埃尔多安说：“自2002年11月起，我们（指代埃尔多安与正发党）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继承了土耳其的遗产。20年来我们一直说‘不要停止，不断前进’，发展、壮大和丰富了我们的国家。”“今天我作为一个兄弟、一个政治家、一个统治者，自信满满来到你们面前，全心全意地履行对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承诺。随着共和国在2023年到达100年，我们将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土耳其世纪的建设。”“在世界面临新的紧迫挑战之际，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土耳其世纪计划，为我们共和国的新世纪创造一个强劲的开端。”^② 埃尔多安在演讲中，利用土耳其建国百年这一关键节点，把自己、正发党与国家加以捆绑，以说明三者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联系，强调“土耳其世纪”愿景这种前景化意象。埃尔多安列举出教育、卫生、交通、体育等多方面详细统计数据，例如，在其执政之下的正发党是如何将教室数量从34.3万间增加到61.2万间，将病床从16.4万张增加到26.4万张，将国内机场数量从26个增加到57个，或者将国内生产总值从400亿里拉增加到4070亿里拉。^③ 埃尔多安通过这些具体数据，列举正发党在他领导下的过去2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并将之置于共和国的历史之中，由此证明其辉煌和伟大，进而宣示他和他的政党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领导国家及其人民完成重大的任务。埃尔多安在演讲中最后号召每个人为“土耳其世纪”作出贡献，讨论这个世纪，提出建议，并创造和建设一个土耳其世纪的愿景。从2023年5月竞选结果来看，埃尔多安的成功连任从侧面表明了其成功建构起“土耳其世纪”愿景，引导民众的思维和行动始终面向未来，进一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塑造和凸显其作为土耳其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

^① Blake Ewing, "Conceptual History, Contingency and the Ideological Politics of Tim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26, No.3, 2021, p.263.

^②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p.3,8,5.

^③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p.11-16.

其次，土耳其国家治理在埃尔多安时代相对成功，为其施展更大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坚实保障，也进一步激发出其昂扬的斗志。土耳其在中东混乱的局面中交出了良好的发展成绩，甚至被认为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过去20年间，土耳其经济实现了显著增长，出口额从360亿美元增至2500亿美元。2002—2021年，土耳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34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20%。^①相较之下，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较为缓慢，更衬托出土耳其经济发展成绩的来之不易。与此同时，土耳其已成功地完成了马尔马雷隧道、亚武兹苏丹塞利姆大桥、恰纳卡莱大桥和新伊斯坦布尔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土耳其公司向全世界228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他们的产品。^②这是土耳其过去20年经济进步的缩影，表明其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从具体领域和部门看，土耳其国防工业取得长足进展。2002—2022年，土耳其国防工业在国内军事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从20%增长到80%，^③成长为有能力向170个国家出口国防工业产品的武器出口国。^④有三组数据可以证明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态势：国防项目数量从62个增至750个；国防项目总预算从55亿美元飙升至600亿美元；国防研发预算从4900万美元飙升至12.4亿美元，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的出口增长了13倍。^⑤土耳其政府尤其重视国防工业技术的发展，以期为建设强大的经济创造条件。此间，土耳其本土无人机开发商拜卡技术公司（Baykar Technologies）和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TUSAŞ）异军突起，全球竞争力显著增强。2021年，拜卡技术公司销售了价值6.64亿美元的武装无人机，成为土耳其国内最大的航空航

① Kemal İnat and Burhanettin Dur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Face of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Insight Turkey*, Vol. 25, No. 2, 2023, p. 81.

②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15.

③ "100 Years On: Türkiye's Burgeoning Economy," *Hürriyet Daily News*, October 29, 2023.

④ "Cumhurbaşkanı Recep Tayyip Erdoğan'ın 'Türkiye Yüzyılı' Tanıtım Toplantısı Konuşması," p.16.

⑤ Kemal İnat and Burhanettin Dur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Face of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Insight Turkey*, p.85.

天和国防出口商，而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以5.67亿美元的出口额排名第二。^①为了摆脱对他国的国防依赖，土耳其注意发挥本国在国防领域的主导作用，下大力气提高先进国防技术发展的自主性。近年来，土耳其在生产原创国防产品方面迈出了革命性的步伐。2023年7月，拜卡技术公司与沙特国防部签署协议，批准向沙特出售全球知名的土耳其武装无人驾驶飞行器，这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大的国防合同。^②

再次，国际体系深层次的变迁为土耳其施展抱负提供了机遇。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一超独霸局面的出现，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建设遭遇严峻挑战，近几年来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突发和巴以冲突再度升级加剧了土耳其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不稳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最近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至今的多边机构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和经济动态，因此需要改革以建立一个公正和公平的新秩序”。^③国际体系的变化和调整对不同国家和国际行为体有着不同的意蕴，也将土耳其国家发展推向新的十字路口。土耳其在很长时间被称为“欧洲病夫”或称“西亚病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领土，至少在20世纪前半期仍处于全球政治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与欧洲国家和美国建立了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土耳其极力主张和支持联合国改革，以期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彰显其大国雄心和争当全球大国的意愿。

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和转折性为土耳其推行更加自信的大国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实践舞台。土耳其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特殊的道路选择、多样的国际身份是大多数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使其可以在多种行为体之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发挥中介和调解的作用。2020年9月纳卡冲突

① Ayşe İ. A. Özer, *The Rise of the Turkish Defense Industry*, SETA Publications, 2019, pp.130-132.

② “Saudi Arabia in Pact with Turkey’s Baykar Tech to Localise Drone Manufacturing,” Reuters, August 7, 2023.

③ “Press Conference by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United Nation, September 13, 2023.

爆发,土耳其高调参与、深度介入,以军事行动及外交访问等形式支持阿塞拜疆。^①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正是进取型外交政策在突厥语地区的实践。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土耳其积极斡旋,在俄乌之间选择中立立场,并成功地推动了“黑海谷物倡议”,^②使得安卡拉成为西方与俄罗斯举行外交会晤的首选地点,凸显土耳其在大国外交中的独特地位。这表明土耳其地缘政治重要性正在上升,其影响力不断超越地区界限,进而积极介入大国竞争并能够发挥平衡作用,参与设置全球议题和重大变革议程。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穿梭外交中,“土耳其世纪”和“土耳其支轴”等概念得以生成。土耳其借助世界多极化和西方相对衰落的大趋势将外交战略的触角从亚洲、欧洲不断向外伸展并扩大至美洲和非洲,在国际体系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因素。

最后,中东和环黑海区域互动性的增强以及西方在这些区域影响力的持续收缩为土耳其的区域外交调整提供了恰当时机。土耳其在黑海的战略位置连接着俄罗斯、中东、中亚和欧洲,这一地理优势使土耳其成为乌克兰危机的重要介入者,以及西方遏制俄罗斯之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中暴露出土耳其地缘政治的潜能和海权重要性,以及西方对于土耳其的战略需求。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美国和欧盟正积极寻找适当的应对策略。黑海地区在地理上远离跨大西洋核心共同体,美国和北约需要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伙伴来施加和扩大战略影响,于是选择了在西方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土耳其。如果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埃尔多安与普京的密切关系可能成为西方能够利用的一个重要杠杆。因此西方对于土耳其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态度也显得复杂,而非简单的反对。土耳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重要性在更广泛的黑海区域逐步

^① 曾向红、王昊语:《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第50页。

^② “Black Sea Grain Exports Deal ‘A Beacon of Hope’ Amid Ukraine War,” *UN News*, July 22, 2022.

显现。土耳其可以帮助维持高加索地区的稳定,并推进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

土耳其在相关问题上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土耳其自从二战后加入北约组织以来,一直充当美西方遏制俄罗斯扩张的战略屏障。1936年签署的《蒙特勒条约》增强了其在监管黑海航运安全方面的职能,也巩固了土耳其为西方联盟遏制俄罗斯扩张的地缘地位。土耳其寻求依托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在中亚地区扩大其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黑海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土耳其地缘战略的核心,控制黑海的进出通道对提升其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显然,土耳其在这些地区有自己的外交目标和议程,它们属于“土耳其世纪”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复杂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放大了土耳其在相关事务中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关系正常化趋势也为土耳其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阿拉伯之春”破坏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传统秩序,使中东十多年来面临全面变革的压力。在特朗普和拜登先后执政的整个时段中,中东许多国家以不同速度推进“去美国化”。奥巴马政府在对叙利亚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美军在2009—2010年从伊拉克撤出后重新在阿富汗部署兵力、在利比亚“分担负担”和“幕后领导”的战略,均助推了地区内的“去美国化”进程。^①美国减少参与中东事务反映了其对全球优先事项的重新评估,缩减在中东区域军事存在为其题中要义。拜登政府完全撤出阿富汗并将控制权移交给塔利班政权,令美国在中东的伙伴国感到不安。而2022年2月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拉低了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关注程度,促其将关注重心转移到东欧和北约。对中东国家而言,确保地区安全更成当务之急。它们加强合作,共同解决安全关切、打击恐怖主义和有效管理的潜在冲

^① Ismail Numan Telci, “From Cooperation to Consolidation: The Future of Turkish-Gulf Relations,” Al Jazeera, October 4, 2023,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analyses/cooperation-consolidation-future-turkish-gulf-relations>.

突,从而减少地区风险,以维护自身利益。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冲突和竞争之后,该区域国家开始寻求关系正常化进程,两大对立阵营之间走向和解,新的区域格局似乎正在形成。2023年,土耳其同原本交恶的区域国家实现了双边关系不同程度的解冻和复苏。4月,土俄伊叙四方会谈将土叙关系正常化问题重新摆上了谈判桌;7月初,土耳其和埃及宣布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随后埃尔多安开启了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海湾三国之行,土耳其与海湾三国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尤其是土阿签署的13项协议总价值达507亿美元;^①12月,土耳其以和希腊关系正常化的重大进展为和解之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以看出,土耳其迅速顺势而为、调整了区域政策,将中东地区作为外交中的优先考量,通过积极参与和解浪潮,通过参与维护区域稳定,不断提升自身区域影响力。

目前,中东与黑海两大区域的互动是历史联系继续,折射出国际秩序演变的复杂性和大方向,凸显了土耳其作为区域大国的重要作用。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道路选择使其在美西方的关键外交政策中占有中心地位。就黑海区域而言,乌克兰危机使黑海地区重新进入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安全关切之中,甚至使该地区列入决策议程中的优先事项。就中东而言,巴以冲突的升级在多个层面影响到了黑海的局势。在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土耳其周边的战略环境对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调整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变量,可谓“土耳其世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的开篇之作和基础之作。

三

“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的提出显示了土耳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

^① “Erdogan Ends Gulf Tour in UAE with Agreements Worth \$50bn,” Nikkei Asia, July 20, 2023,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Erdogan-ends-Gulf-tour-in-UAE-with-agreements-worth-50bn>.

求国际中枢地位的宏图大略。然而，主观意愿需要与能力相辅相成，更需要与客观现实相互协调。土耳其作为谋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大国，在确定战略目标及其实施措施时必须充分发展自身实力，同时正确解读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国际体系的变化规律，此间必须审慎进行战略和政策的调整。2023年以来，土耳其的安全和外交政策一直处于调整过程中。“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的实施目前刚刚起步，未来能否顺利推进和何时最终实现皆有待观察。

从长期看，“土耳其世纪”愿景宣示了土耳其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自主性战略追求，其实践有助于助推新国际体系的生成，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人民愿望。土耳其前外交部长、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 (Ahmet Davutoğlu) 在《战略深度》一书中将土耳其塑造成地区超级大国，甚至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强国。这种概念化观点增强了人们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兴趣，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知名度和正面形象；同时表明土耳其正发党精英并不满足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锐意朝着更高目标前进。埃尔多安总统“世界大于五”“更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的座右铭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土耳其国家对于全球政治等级秩序重组的愿望。^①在2021年9月14日开幕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埃尔多安提出了自己对于新国际秩序的理解，即“更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这一论断。^②在此之后，土耳其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国际组织的全面改革，希望借此机会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如《土耳其世纪宣言》文件中所指出的，土耳其将领导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建设性政策，努力帮助国际体系以更有效和无缝

^① Muharrem Eksi, *The Rise and Fall of Soft Power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During JD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6, pp.44-46.

^② Meryem İlayda Atlas, “Erdoğan’s Call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Fairer World Is Possible,” *Daily Sabah*, September 23, 2021.

的方式运作。在国际组织的效力和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当下，土耳其迫切希望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将其作为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是联合国最高决策机构重组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在2021年撰写的《更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联合国改革提案书》中指出，后疫情时代诞生了一个新的、多极的世界，但多极世界并不保证和平、安全和稳定，因此应该采取“联合行动”，维护全球正义，“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机构”。^①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Hakan Fidan)也强调，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应确保公平和效率，土耳其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②

然而，从短期看，随着全球权力斗争日益加剧，全球形势和秩序变革的不确定性陡增，使“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的实施无疑会面临多重挑战，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第一，“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及其政策选择是否配得上土耳其作为全球参与者的雄心，即大国抱负与现实能力的配适度。土耳其学者齐亚·奥尼什(Z. Öniş)指出，土耳其属于“新兴中等强国”，这一概念就暗含其固有某种局限性和能力有限性之意。土耳其的决策者一直怀有远大抱负，但若无法在国家的能力与愿景之间达成大致平衡的话，可能带来不利后果。^③同时，作为新兴中等强国，土耳其在结盟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土耳其对西方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持批评态度，可能导致与西方盟友的疏远；单方面寻

^① Berdal Aral, “The World Is Bigger than Five: A Salutary Manifesto of Turkey’s New International Outlook,” *Insight Turkey*, Vol. 21, No. 4, 2019, p.72.

^② “Speech by H.E. Hakan Fid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14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Türkiye, August 7, 2023.

^③ Z.Öniş and M.Kutlay, “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Middle-Power Influenc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radoxical Case of Turke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1, No.2, 2016, pp.1-20.

求与其他新兴大国建立联盟,又可能不利于其在全球治理中提升地位和影响力。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系主任约翰·拉文希尔(John Ravenhill)在谈到中等强国的周期时,提出了权力悖论问题:当一个新兴大国的决策者高估自己的实力并选择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时,反而会损害该国的国际形象,并破坏其地区信誉。^①换言之,这些国家很容易因物质力量不逮而陷入无法实现的雄心壮志和目标之中,结果欲益反损。埃尔多安总统善于制定宏伟设想,此前于2011年提出的“2023愿景”,旨在使土耳其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在建国百年到来之际,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出口额、通胀率和失业率等主要指标看,“百年愿景”的多数宏观经济目标未能如期实现。^②因此,在“土耳其世纪”愿景提出之时,妥善处理大国抱负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且对土耳其尤为重要的迫切问题。

第二,“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能否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目前,土耳其经济严重低迷,通胀率飙升,本币里拉严重贬值。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0月,土耳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上涨85.51%,通货膨胀率创24年来最高。^③随着土耳其经济问题增多或加剧,解决高通货膨胀问题已经成为埃尔多安政府的首要任务。埃尔多安成功连任总统后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土耳其世纪”初期的三个主要目标,其中一个便是将土耳其飙升的通货膨胀率降至个位数。选举之前,面对39.59%的高通胀率,埃尔多安任命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西姆塞克(Mehmet Simsek)、中央银行行长哈菲泽·盖伊·埃尔坎(Hafize Gaye Erkan)组成新经济团队,以求整顿局面、解决问题。2023年6月以来,

^① John Ravenhill, “Cycles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nstraint and Choice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3, No.3,1998, pp.309-327.

^② 邹志强、俞海杰:《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土耳其“百年愿景”的经济成效评析》,《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第74页。

^③ “Consumer Price Index, October 2022,” TÜİK, November 3, 2022.

该经济小组已将利率大幅提高31.5个百分点，并在9月的中期计划中提出了纠正经济失衡的系列措施。11月份的物价比上年同期高出62%，但月通胀率一直在下降，从7、8月白热化的9%降至最近几个月略高于3%的水平。2023年上半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下跌了近30%。^①世界银行在2023年的报告中肯定了土耳其经济政策，认为土耳其政府2023年5月选举后采取的积极措施促进了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并且预计土耳其经济未来几年将加速增长。^②可以看到，土耳其的经济还没有走出困境，但正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似乎迈上了正轨，存疑的只是能否在质和量上支撑其世纪抱负。

第三，国际局势的风谲云诡意味着土耳其战略调整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际体系难以为大部分地区供给和平、稳定和正义。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加剧紧张局势和两极分化，国际体系的失衡隐藏着不可预测性，反过来又加大了现行国际秩序的脆弱性。世界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环境、技术和社会等诸领域面临巨大挑战。与许多中等国家一样，土耳其正寻求通过实施大国平衡策略，避免过度依赖于某一方。但是，现实极其严峻，土耳其向西是美西方联盟的一方，向东则是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其在大国之间以及在欧洲和欧亚大陆之间、在西方倾向的世俗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主义之间左右为难。

显然，“土耳其世纪”战略愿景面临重大挑战。有些挑战是长期的甚至是结构性的。如库尔德问题的解决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极大地限制了土耳其外交与安全的活动空间。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和美国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的角色上存在分歧，这将继续存在或许还会加大。更为重要的是，未来叙利亚如何构建新的国家且如何安置库尔

^① “Turkey’s Economy Has Improved, But Its Foreign Policy Is Still Messy,”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7, 2023.

^②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Economic Update*, The World Bank, Fall 2023, pp.81-82.

德人，将直接影响到土耳其的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行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远非乐观。库尔德问题直接决定了“土耳其世纪”的反恐成效。再有，塞浦路斯问题的久拖不决不仅仅限制了土耳其区域大国的抱负，而且损害其国际形象。土耳其一直不承认塞浦路斯，并继续推动以“两国方案”解决塞浦路斯分裂问题，这固化了土耳其—欧盟关系的僵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还有，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其突出表现为土耳其与欧盟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2023年12月，欧洲理事会重申，土耳其与欧盟进一步疏远，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2018年6月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依然无法考虑进一步开启或结束。^①乌克兰危机造成地区战争的回归，使得整个欧洲的团结成为绝对的政治优先事项，欧盟给予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候选国地位、芬兰和瑞典领导人放弃本国中立并申请加入北约等，都与土耳其直接关联起来。土耳其在追求独立外交的同时，必然会遭致西方更为激烈的批评甚至惩罚，土耳其对于国际体系变革的作用由此大打折扣。

此外，多个地缘政治热点的升温也给“土耳其世纪”愿景增添了新的变数。近期，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尽管埃尔多安早些时候成功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成功推动联合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达成“黑海谷物倡议”，帮助将乌克兰的粮食产品通过黑海运往全球市场，但普京称在西方满足莫斯科对其农产品出口的要求之前，不再续签乌克兰粮食协议。^②埃尔多安与普京之间关于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天然气枢纽的谈判也陷入僵局，表明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建立更密切的能源关系上存在分歧。事实上，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充满矛盾。因此，土耳其将自己作为俄乌

^① “2023 Communication on EU Enlargement Policy,” European Commission, November 8, 2023.

^② “Russia Won’t Renew Grain Deal Until Demands Met, Putin Tells Erdogan,” Al Jazeera, September 4, 2023..

和解的关键掮客角色这一定位具有不确定性。若乌克兰危机深陷僵局，土耳其如何处理其与俄罗斯的长期关系将会更增变数。雪上加霜的是，自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和加沙爆发战争以来，中东和解潮遭遇了重大逆流，土耳其的黑海政策受到羁绊。正如乌克兰危机在将世界撕裂一样，巴以冲突也给土耳其与以色列、美国和欧洲本已困难重重的关系注入了新的破坏性因素。此外，2024年1月3日，伊朗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该事件负责。^①“伊斯兰国”的重新抬头加上加沙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排除其他极端组织和势力趁乱制造事端的可能，中东地缘政治形势难免更趋混乱。这给土耳其反恐目标的达成打上了大大的问号，也给土耳其的战略抱负蒙上了阴影。有鉴于此，土耳其无论是在促进地区冲突降温还是在维系与美西方脆弱的关系方面，都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

再者，环黑海区域同样深受乌克兰危机的牵扯，使得土耳其在黑海的权益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环黑海区域和中东在某种程度上连接成了新的冲突线，引发多重危机，干扰了相关区域乃至更远的国际局势，尤其考验土耳其的危机管控能力，遑论其外交和战略抱负的顺利实践。2024年是“土耳其世纪”的开局之年，土耳其如何在区域动荡形势中保证自身的安全当属首要任务。■

（责任编辑：黄昭宇）

^① “Islamic State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Deadly Bombings in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24.

intervention of the Modi government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relying on the ASEAN-centric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terven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collabo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operat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 to strengthen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presence, as well as expanding influe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India’s increased involvement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is partly due to its geopolitical interests in balancing China, and partly becaus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a priority direction for India to surpass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and advance its dream of becoming a world power. The reason why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become its priority is mainly based on the game pattern between India’s neighboring powers and India’s cultur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l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rn India,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India and its major partners in confronting China, and the inability of the Indian Navy’s domestic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to support its deep-sea strategy, India’s intervention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still faces many constraints.

Keywords:

“Act East Policy”, Asia–Pacific security,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Ladd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oward China

Liu Jin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omprehensive decoupl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China,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is characterized by “laddering decoupling” in terms of objectives, contents, paths, tools, and instruments.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laddering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driven by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gendas, and a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 latest adjustmen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is increasingly confusing and dangerous. However, the laddering strategy is flawed by the US incapability of providing matching power,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trategic benefits and costs, and the US hegemony hinder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oward China fails to achieve its intended targets.

Keywords:

US, Biden administ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US–China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New National Strategic Vision of “Century of Türkiye”

Liang Qin and Li Yubo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new national strategic vision of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was put forward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involves not only Türkiye’s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security and diplomacy, but also its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next hundred years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its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new national strategy stems from the electoral needs of Erdogan and his party, the response to the new geopolitical realities, and the Turkish ideal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The success of the vision of the “Century of Türkiye” will depend not only on Türkiye’s efforts, but also on the trends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severe neighboring situation will greatly limit the possibility for Türkiye to achieve its goal.

Keywords:

emerging economy, Century of Türkiye, national strategy, Black Sea regional security, Erdogan